试论十八世纪清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节问题为中心*

任桂淳

This paper is based on works of thre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school of northern studies. From these works, we can learn the attitude of Korean scholars toward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Qing culture upon korean scholar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on the sino-centric ideology of the school of northern studies and deals primarily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school of northern studies to change the negative views of Korean scholars toward the Qing court. The second part is on the idea of the utilization for better life and the attempts of the school of northern studies to introduce Chines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to Korean society.

序

朝鲜半岛地处亚洲大陆的东北部,位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自古以来,朝鲜主要是通过与之毗邻的中国来吸收汉文化的。当时,朝鲜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以通过朝贡这一轴心展开的。在朝鲜人心目中,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进行维持的,因而,他们只承认中华思想文明圈,而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圈。在这一文明圈中,中国皇帝起着连接天和人的纽带作用,所以才被人们尊称为天子。十八世纪的朝鲜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天命观来维持着频繁的朝贡关系的。这种朝贡内容很多,其中有中国皇帝给朝鲜的王位继承者册封王位,让朝鲜使用中国的历书即时宪书,朝鲜要定期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皇帝进行赏赐,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朝贡者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化,中国也实现了它向周边国家传播汉文化的愿望。

这种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因而它包含着某种不安定因素,很容易引起紧张和动摇。

朝鲜根据中国的宗法伦理关系,每年定期在冬至、正朝、圣节、千秋等时节派遣使臣去北京朝贡,此外,还不定期地派遣谢恩、奏请、进贺、陈慰、进香、告讣等使臣去北京。清政府对朝贡的

* 该论文是利用1995年汉阳大学校内研究费写出来的。

答礼则是皇上赏赐。长时间以来，两国以这种朝贡、赏赐关系保持着中国不干涉朝鲜内政而朝鲜对中国则维持着形式上的崇拜关系。朝鲜同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就是这样维持过来的。①

明朝后期，朝鲜同后金（即后来的清朝）之间发生了"丁卯胡乱"、"丙子胡乱"事件。此后，双方会盟于三田渡，清政府以战胜者的姿态用强迫命令方式让朝鲜朝贡。根据当时的规定，朝贡者要负担战争损失费用及其他款项。很明显，这种朝贡是带有掠夺性和强制性的。后来，清政府攻入中原并以支配者的身份君临天下，因而也就减轻了对朝鲜的经济负担，从此时起只维持了一种正常的礼节性朝贡关系。此后，从顺治二年（1645 年）开始，清政府为了彼此之间的便利，双方还决定，把正朝、冬至、圣节、千秋等合为一处一次性派遣使节到北京缴纳贡品。

朝鲜派往清政府的使臣每年阴历十月末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即今日的汉城）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在北京滞留少则四十日多则六十日。尔后，二月中旬再从北京出发返回，三月末或四月初又回到汉阳。此外，朝鲜政府为了从清政府得到颁布的时宪历，每年八月中旬还要派使臣从汉阳出发，十月中旬到达北京，以履行不定期的使节活动。②

明朝灭亡清朝兴起后，朝鲜实行了封闭政策，文化孤立主义倾向比以前更加严重。其后，朝鲜政府通过使节这条通道进入清朝，从而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接触到了中国文化。派去的这些使节，他们的本意在于，除了政治外交以外，还要从经济、社会等诸方面了解情况并进行一些官方或非官方的贸易活动。

朝鲜同清朝进行的这种使节活动，从 1637 年始到 1893 年止，历时 256 年，每年定期派出的使节共达 514 次，再加上不定期的使节交往，其朝贡活动的次数就更多了。每次使节活动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部分记录，其记录，即《燕行录》，共有数百种之多。朝鲜政府正是通过这种资料来把握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唯一的情报来源。

这些使节活动在朝鲜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起到了桥梁作用，通过使臣来往，不少书籍从中国传到了朝鲜，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其中一例。与此同时，清朝的实证学、天主教、西欧的文化遗产及各种技术也随着这一活动传入了朝鲜。

伴随着使节活动的不断开展，两国学者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通过超越国境的友好交谈与坦诚的文化批评，朝鲜学者逐渐理解和接受了清朝文化③，从而活跃了朝鲜的文艺创作、充实了朝鲜的文化思想，也促使朝鲜政府对清朝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始，学者也逐渐成了赴清访问使团的成员。这些人从清朝学习考察回来之后，不少青年学者便主张赴清留学，学习中国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并用自己学来的东西改革朝鲜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体制。后来，这些人就被人称为向中国学习的"北学派"。有人也称他们为"利用厚生学派"。"北学派"们呼吁朝鲜政府不仅要和清政府进行工商业方面的交流，而且还主张对本国的一些生产工具也要进行改进。虽然，后来他们的这些主张都没有得到实现，但对转变朝鲜王朝对清政府的看法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到了十九世纪，"北学派"的思想对朝鲜"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文将着重对"北学派"的重要人物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及他们的得意门生，如奎章阁检书官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以及他们的重要著作《湛轩书》、《热河日记》、《北学议》等进行深入研究。在这里，本文首先想就当时朝鲜学者层中对清朝的认识以及对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的态度进行一下分析，并以"北学派"的"华夷论"为题进行一些探讨。其次，为了考察当时的中国文化到底对朝鲜学者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还将以"北学派"所主张

的“利用厚生”为题进行一些探讨。

《湛轩书》的作者洪大容(1731--1783),出身于仕宦家庭。其曾祖父曾在朝廷任参判士,祖父也曾作过地方官。洪大容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除对传统儒学外,对数学、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也很有造诣。不仅如此,他对西洋科学及经世学也十分关注。洪大容还是最早在朝鲜提出“地转说”的人。

洪大容是北学派的先驱,1765年(乾隆三十年)入燕,写下了《湛轩书》一书。该书既有著述,也有政策论、书简及笔谈录等。④

《热河日记》的作者朴趾源(1737—1805),年龄比洪大容小六岁。其祖父也曾作过政府官吏,远亲三表兄是英祖驸马,算得上是一个显贵家庭出身的学者。朴趾源1780年(乾隆四十年)入燕。因为入燕前,朴趾源已经从洪大容、朴齐家口中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中原的消息,所以,当时他是带着浓郁的求知欲和特别的探求心赴清访问的。入燕后,他不仅对车舆、道路、家居、农具等现实生活进行了仔细考察,而且对清朝的统治政策以及清政府治下的汉人士大夫的动态进行了深入观察。后来,他写下了《热河日记》,其内容包括纪行文、笔谈录、小说等。文章中他承认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并很强调士大夫们的先觉使命。他以农本主义为立足点,主张朝鲜政府一定要使从事农桑的人心地淳朴善良,这才是“制治保邦之本”。⑤

《北学议》的作者朴齐家(1750—1805),同朴趾源是师兄弟,因而,他也可以说是“北学派”一边的人。朴齐家在奎章阁作了十三年的检书官,后来,他又于1778年、1790年5月、1790年10月、1801年四次去中国访问,亲眼目睹了清朝乾隆时期的文化状况,并同清朝的著名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因为朴齐家出身于平民家庭,所以他能用更加敏锐的目光观察社会并对此进行评论,也更能提出对朝鲜社会进行改革的主张。燕京纪行文《北学议》一书集中论述了北学的内容,学习北学的长处和不学北学的短处。他认为同海外通商能使国民受到开放思想的启迪,所以提出了贸易立国的主张。当他谈到工农业的时候特别指出了在工业方面进行改革和学习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并强调,常说的士农工商的商不应该放在最后发展,而应当重视商业,让它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在这里,他还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及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起媒介作用的商业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商业的发达自然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他能提出这一重商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⑥

一、华夷论

从朝鲜的立场看,明朝是在“壬辰倭乱”时,也就是万历年间曾派遣军队帮助过自己的,但清朝却是制造“丁卯胡乱”、“丙子胡乱”,是侵略朝鲜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强迫朝鲜向清廷纳贡。因而,当时在朝鲜儒学者之间尊明攘夷(夷指清廷)的风潮很盛,有人还扬言要征伐清朝,朝鲜政府并为此而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当时,在朝鲜的儒学者看来,全世界都充斥着北胡、倭夷和洋夷,就连中国的中原地区也被“夷人”所占,而只有朝鲜才是一块“小中华”的净土。

中华思想如果从五行相生和相克的哲学观点看,阴阳五行近相生,远相克,生活在阴阳相生中间的中就是中华,生活在这“中间”的人就是中国人,也就是文明人,而没有受到阴阳相生,生活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便是野蛮人。这种把明朝视为正统中华的思想形成了“小中华”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为出发点,把朝鲜封闭在了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一个小圈子里。

一直被视为胡夷的满洲,它举兵消灭了宗主国而建立了支配中原的统一国家。这一举动,

在朝鲜的士大夫们看来是“犯上作乱”，因而他们所支配的中原也被认为已经不是正统意义上的中华，所以，这些人也才从思想深处不愿接受清朝的文化了。

朝鲜经壬辰、丁酉倭乱和丁卯、丙子胡乱之后，农民大量逃亡，许多社会制度也被破坏殆尽，官僚与地方土豪对土地的兼并日益严重，因而要恢复国力是相当困难的。可是，当政者的士大夫们对此却漠不关心，不去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大事，却只热衷于服丧世子册封等的细枝末叶问题。

朱子学的原理之中就有修己＋治人＝经世的理论，而本来就包括在这一理论之中的“正德”与“利用厚生”却受到了排斥，因而使这一理论变成了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空洞的理论，所以，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们也便只偏重于“修己”与“正德”而忽略了“经世”与“利用厚生”，儒生们也只热衷于内心的自我修养。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们只埋头于研究作诗行赋的技巧而对社会问题却漠然置之，没有多少人去理会。⑦

丙子胡乱使朝鲜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明朝灭亡后，曾是“夷狄”的满族统治了整个中国。朝鲜面对这种被颠倒了的臣属关系，便想报仇雪耻，所以就想推行北伐政策。但是，朝廷感到这是以卵击石，显然北伐是无法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家们便从朱子学的“明天理正人心”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他们认为，区别夷狄与文明中华的标准必须以朱子学的心性学理论为基础，不管是谁，只有继承和实践正统的“礼”才能称之为中华。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朝鲜的士大夫们便潜心研究起了心性论及礼论。这样做的结果，就使理论与社会问题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针对这种情况，朝鲜便产生了一种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实学派，他们反对朝鲜朱子学派的“空理空谈”，抨击当政者的无能与腐败。实学派们继承了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思想。其代表人物柳馨远(1622—1676)就在他的《磻溪随录》中阐明了这一学派的主张，从而使这一学派具有了某种权威性。

进入 18 世纪，学界对“人物性同、不同”、“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明德分数有与无”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表明，北学派和朝鲜朱子学派不同，他们已经逐渐脱离心性学纯理论的圈子而开始对物性问题进行研究了。逐渐地，他们的自然观也发生了变化，并开始了对数学及经世学等的研究及对经书和史书的考证。后来，北学派们对西学(天主教及自然科学)也产生了兴趣。随着对欧洲自然科学的涉猎，他们完全摆脱了朝鲜朱子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而开始使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社会现实越来越接近了。

十八世纪，朝鲜农村“贫益贫，富益富”的现象日益严重，流民不断增加，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被朝廷罢了官的知识分子及不愿参加科举考试的在野学者便都纷纷加入了北学派的行列。

这一时期，正是英祖(1725—1776)和正祖(1776—1800)在位时期。朝廷内党争十分激烈。两位皇上为了缓和矛盾，采取了荡平策，正祖还为了抑制掌权人物中“老论派”的专横，把北学派的人物都安插在了各级要职上。与此同时，还和清展开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并对乾隆时期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翻译工作。这就为北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朝鲜北学派的势力得到了加强。⑧

主张“利用厚生”的北学派人物朴齐家、李德懋、柳德恭被提拔为奎章阁的检书官，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中华文化。因而，他们才以经世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许多制度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正确主张和理论依据。

北学派对经世学的研究从他们到中国去之前就开始了，自从到中国去过之后他们亲眼目睹了清朝文化，因此也便提出了“如欲利其器，则莫如学中国”的主张。不仅如此，他们在批判传统的华夷名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也要承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理论。

北学派认为，为了使“利用厚生”的主张能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就必须打破“华夷论”这一陈腐观念。就现实情况看，不管是“夷狄族”的清朝，还是西方国家，为了取得发展，都不得不扩展视野来学习别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北学派们为了培植中华文化的理论土壤，敢于向“华夷论”宣战，一扫斥清尊明的学术空气，敢于面对现实，提出向清朝学习的主张，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

北学派先驱洪大容，主张“世界认识与人、物同性”，他以“天圆地方”为依据把世界看成一个多元体，而且认为好与坏都是相对的。洪大容在《湛轩书》的“翳山问答”中指出，“夫地块旋转，一日一周，地周九万，一日十二时，以九万之阔赵，十二之限，其行之疾，亟于震电，急于炮丸。”根据他的地转说理论，认为世界不应有华夷之分和内外之别。他说：“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各国人均系“天之所生，地之所养，凡有血气均是人也。出类拔萃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门深濠，谨守封疆，均是邦国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题，均是习俗也。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⑨他引用朱子所主张的不应把夷狄从人类中排除出去的理论，说明不应当以种族、习俗和居住区域来划分华与夷。洪大容还进一步阐述道：“夷狄之所以为夷狄者亦何哉？岂非以无礼仪、无忠孝、性好伐而类禽兽哉?若今时之夷狄也，以其久居中国务其远图，稍尚礼仪，略仿忠孝杀伐之性，禽兽之行，不若其初起之甚。”⑩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区分华与夷的界限是以文化为分水岭的。只要他有文化，即使被称为“夷狄”，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起来的，但他有文化，所以，朝鲜人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不应该鄙视他们。

分析一下洪大容的哲学思想即“人、物同性”论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人与物的区别在于心，心与物的区别在于身，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人、禽兽、草木都属于生物，人类只觉得人有礼仪而把自己看得最高贵是不对的。禽兽、草木也都有自己的“五常”和礼仪，人类也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处。所以，圣人也拜万物为师，向万物学习。人与万物在天看来都是平等的，简言之，从客观的、相对的角度看人与万物都同属于一个范畴。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便是“性同气”。“未发心体本善，明德分数有”。

此外，洪大容还重视未被发现的本然之性。他对万物的认识不是从人类立场出发，而是从物自体的立场出发来考虑的。他对万物的认识，不是从人类立场出发，而是从万物的立场出发的。他把包括人、天在内的万物看成都是具有仁义观念的，因而，人类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草木也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洪大容的这一思想，打破了以人类为主进行思考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而强调了对物性的客观认识，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⑪这一飞跃的理论认识是这样的：在很远很远的那个时代，水、土、气形成了地球，地球受到太阳“火”的照射，发生了气化现象，气化的结果产生了生命体，这就是太古时代。洪大容认为太古时代是人类的理想世界。后来，人类从太古时代起就沿着一条从善到恶的时代走了过来。在中国，人们也把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时代作为具有这种朴素德性的时代看待。那个时代人们实行的是圣人政治。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及社会风俗习惯的变迁，这一社会逐渐变成了强者压迫弱者的社会。对此，圣贤们便诱导大家用礼乐制度来整治社会，以使社会走向文明。但是，后来人们抛弃

了用礼乐制度来约束社会与自然的本来意图，而巧妙地利用礼乐制度来加强了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其结果，使中国逐渐变得十分孱弱，很多理论也变成了"空理空谈"的空洞理论。同这一空洞理论相比，骑马射箭的夷狄则显得更为实用；同穿着暖和的裘衣，吃着用火烧蒸的食物但体质又很虚弱的中原人相比，在寒冷中住着帐篷，吃着自己挤的牛奶但体质却很强壮的外族人则显得更有力量。由此看来，中原人由兴盛到衰弱，而夷狄族则由弱小到强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被明朝视为夷狄的满族人逐渐强大，取代明王朝就是理所当然的了。⑫因此，清朝政权不能被看成是夷狄政权，而应该看成是中华政权。

在洪大容看来，华与夷之分本来就是以中原和周边这一地理概念为其依据的。朝鲜人也知道自己本来就是九夷中的一夷。在中原人看来，原来被称之为夷狄的人不懂礼仪、忠孝，喜欢杀戮，行同禽兽，而洪大容通过赴清之行却清楚地认识到，清人崇尚礼仪，提倡忠孝，同过去人们心目中的夷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满族人不能称为夷狄。他们既可成为圣人，也可成为贤人。再加上，朝鲜自己本身长期以来也被中原人称为夷狄，那就更没有理由把清人称为夷狄而把自己看作是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小中华"了。

与此同时，洪大容还鼓励朝鲜的学者对天文、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把宇宙中的地球及地球上中国所占的位置进行研究，证明地理上的中国不是正界。此外，他还根据"人、物性同说"认为不应把"禽兽"与人类相区别，他否定人类的自我优越感和礼乐制度的绝对性，并认为，应当承认各国文化的个别与特殊性，而不应一概而论。就是从以中国文化价值为中心的"华夷论"观点看，朝鲜与满族同属夷狄族，因此，朝鲜人不应蔑视满族而只看重自己；再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强调礼乐制度的明朝的堕落和清朝的勃兴都是很自然的，因而吸收优秀的清文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应斥之为异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洪大容认为"华夷论"的陈腐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加以排除。朝鲜人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学习并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朴趾源对华夷论的看法。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驲汛随笔"中记述了当时朝鲜士大夫对清朝的一些不同看法。

朝鲜的上层知识分子认为：清人从皇帝、文武百官到庶民百姓全都剪去了头发，同犬羊剪毛一样，因此被人称为"胡虏"，没有什么可学的。朝鲜的中层知识分子热衷于苦读充满尊华攘夷思想的《春秋》，对满人入主中原认为是："神州陆沉则山川变作腥膻之乡，圣绪湮晦则言语化为侏儒之俗，何足观也。诚得十万之众，将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而朴趾源则不同，他自认为自己是下层知识分子，因而，朴趾源的观点，就和中层知识分子不同，他认为，尊周的思想只应局限在尊周的范围内，而不应认为一切都要用周的模式去衡量；夷狄的问题也只应在他们还没有摆脱夷狄的做法时去谈，而不应一成不变地总把他们看成野蛮人。清王朝确系夷狄人占据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但它却始终保持着故有的中国城郭和建筑及正德、"利用厚生"、工具、学统和法度，这个政权下的人民也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朴趾源强调，真正为天下之士者，即使法度出于夷狄，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也要向这些夷狄人学习。即使朝鲜要准备北伐，想把夷狄从中原赶出去，也得向中国学习农业、工业和商业，这样才能使朝鲜强大，并积蓄起北伐的力量。例如，清人的"利用厚生"工作就做得很好。他们用破砖烂瓦垒墙或铺地，用人类尿作肥料使废物变成了金子。⑬这些都是值得朝鲜学习的。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玉匣夜话"中指出："诚能请遣子弟入学游宦，如唐元故事，商贾出入不禁，彼必喜其见亲而许之，妙选国中之子弟，剃发胡服，其君子往赴宾举，其小人远商江南，

觇其虚实结其豪杰，天下可图而国耻可雪。”⑭

朴趾源在他的弟子朴齐家所著的《北学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庐将学问，舍中国而何，然而其言曰，今之主中国者，夷狄也，耻学焉，并与中国之故常而鄙夷之。彼诚剃发左衽，然其所据之地，岂非三代以来汉唐宋明之函夏乎。其生于此土之中者，岂非三代以来汉唐宋明之遗黎乎。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况其规模之广大，心术之精微，制作之宏远，文章之焕赫，犹存三代以来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以我较彼，固无寸长，而独以一撮之结，自贤于天下曰：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则亦将何所仿而行之耶。”⑮

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向中国学习上朴趾源和洪大容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认识清政府这一问题上却和洪大容是有差别的。朴趾源认为对清朝应该一分为二，即应当把王朝本身和文化分开来看。王朝本身是少数满族人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但从文化传统看，因为中原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传统是由他们保存下来的。因此，虽则可以把王朝看作夷狄政权，但对其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

这一思想，打破了旧华夷思想的传统观念，一扫因为不承认清政府而不接受清文化的观念，从而才使汉文化在朝鲜半岛得到了传播。

朴趾源又写道：“又诏永（益蜀）正贡外别使方物，此实旷世盛典而固所未得于皇明之世也，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忧而不以荣者何也，非上国也。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⑯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区分上国与大国及力量的强与弱不是被崇拜的必要条件。以前明朝强大并有文化先进的一面，所以朝鲜才崇拜它。如果一个被崇拜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关系，那么这个国家就自然而然失去了它被崇拜的意义。然而，清朝的文化继承的是汉文化，所以要学习它，决不是因为清朝力量强大屈服于它才向清学习的。朴趾源主张，朝鲜首先要承认清朝的存在然后再向他们学习汉文化，即使是夷狄王朝，如果他们有得益于朝鲜的地方就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朴趾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朴齐家认为，“我国既事事不及中国，特别在其衣食之丰足上，不及中国”，并指出，这是“不学中国之过。”在这一点上他和朴趾源的观点是一样的。朴齐家又说，“今清固胡矣，胡知中国之可利，故至于夺而有之，我国知其夺之胡也，而不知所夺之为中国。”这无疑说明，清朝文化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有可学之处。因此，朴齐家才提出了“力学中国”的主张，他说：“今也以堂堂千乘之国，欲伸大义于天下，而不学中国之一法，不交中国之一士，使吾民劳苦而无功，穷饿而自废，弃百倍之利而莫之行，吾恐中国之夷暇攘，而东国之夷未尽变也，故今之人欲攘夷也，莫如先知夷之为谁。欲尊中国也，莫如尽行其法之为逾尊也。若夫为前明复仇雪耻之事，力学中国二十年后，共议之未晚也。”⑰

十八世纪，以正统朱子学为核心成长起来的学者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在接受心性学以后又逐渐接受了数学及经世学的影响。因而，他们摆脱了以心性学为主的思考方式，试图对物进行新的说明，并提出了对物的利用意见。此外，他们还从士大夫的角度经常反省自己，批判流行于社会的朱子的心性论和礼论，支持对“利用厚生”的研究。为了扩展视野，他们多次到中国学习，通过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这些人感到，清朝的文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得多，因此，也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对“小中华”文化的自尊意识和传统华夷论的批判，这样，北学派的思想也便逐渐在社会占了上风。

二、利用厚生学

北学派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和技术改革，其目的在于求得百姓生活的安定和繁荣，而不是期待君主的恩赐。他们主张，应该开展具体的技术研究和对方法的探讨，而不应该抽象地谈道德。因此，北学派的金龙德便认为"对老百姓生活没有用的东西不是学问。"

"利用厚生"的主张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学问，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张资源开发、商工业及产业开发，二是引进技术，提高生产率，为繁荣经济进行技术革新。⑱

北学派们在文化成熟和比较发达的乾隆时期访问了北京，当时清朝的社会同衰微的朝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他们借此机会探讨了朝鲜的社会弊端，并向政府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议，向社会发出进行改革的号召。

朴趾源第一次跨过鸭绿江来到异国土地之后，感到"复至栅外，望见栅来，间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衢平直，两沿若引绳，必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往者洪友德保尝言大规模细心法。栅门天下之东尽头而犹尚如此。前导游览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⑲朴趾源在内疚之余，他将朝鲜和中国作了比较，写道："中国之民虽荒村小户，率皆灰筑，数间之库不用斛包，直输谷于中，或全库，或半库，或环篁于屋中，如大钟，高接于梁，梯而下之，多者可百斛，小者不下二三十斛，往往一室之内，有数堆焉。我国小民之生，皆无朝夕之资，十室之邑，日再食者不能数人，其所谓阴雨之费者，不过蜀黍数柄，番椒数十，悬之于蔀屋烟煤之中而已。中国之民，率皆服锦绣，寝氍毹，有床有榻，耕夫亦不脱衣，皮鞋束胫，叱牛于田。我国村野之民，岁不得木棉一衣，男女生不见寝具，藁席代衾，养子孙于其中。十岁前后，无冬无夏，裸体而行，更不知天地之间有鞋袜之制焉者皆是也。"⑳

在朴趾源看来，朝鲜之所以如此贫困，是因为政府不用长远的眼光去处理国家事务，而只用临时手段去解决问题，他写道："我国之人，曾无朝夕之虑，百艺荒芜，日事纷纷，民以之而无定志，国以之而无恒法，其源皆出于姑息。殊不知姑息之害，至于民穷财竭，国不为国而后已。假如以甓筑墙，数百年不坏，则国中更无筑墙之事，所获多矣，余可类推。今有月坏之墙，岁坏之屋，何也？㉑在这里，朴齐家还进一步指出了朝鲜执政者的三种弊病，他说："臣闻明者不自欺，智者不自弊，夫人才渺然而不思所以培之。财用日竭，而不思所以通之，日世降而民贫，此国之自欺也。位愈高而视事愈简，居官委下属，出疆委众胥，左拥而右扶，曰体貌不可屑越也，此士大夫之自欺也。梏梏于疑义之林，消磨于骈俪之途，束天下之书而不足观也，此功令之自欺也。夫士大夫国之所造也，然而国法不行于士大夫，非自弊乎？科举者所以取人也，取人由科而坏，则非自弊乎？书院而俎豆者，所以崇儒也，而逋丁禁醴依焉，非自弊乎？国家诚能推四欺、三弊之说，而触类而伸之，剔瘼而牖迷，则治国之事过半矣。"㉒

十八世纪中叶，北学派们主张"制治保邦之本"是出于传统的士农工商观。要重农抑商，就要禁止货币流通和提倡节俭，但朴齐家认为要摆脱贫困不能光靠节俭，因为过分节俭则无法使老百姓生活充满欢乐。不穿丝绸，就不会有养蚕业和丝绸织造工；使用瘪皱的泥碗，就不会有制陶工。因此，要使社会发展就得搞产业开发，发展技术，刺激消费。只有生产的东西被社会消费掉，才能扩大再生产。在这过程中，技术也会逐渐提高，逐渐制造出更加精美的东西，社会也就会产生活力。朴齐家还认为，财物如同流水，用完后它又会像泉水一样自动涌出来，不会用其它

源泉也就会逐渐涸竭。生产出来的物件只有不断进行消费，才可能不断进行再生产。㉓朴齐家的这种思想显然是一种很进步的发展型观念，是一种促进社会不断发展的合理主张。

朴齐家也还认为，为了有效地发展生产，就必须学习先进技术，并提倡朝鲜应该从清朝引进各种技术。为了促进技术引进，他建议要把有经验的聪明人派到中国去学习。为此，他在书中写道："今急选经纶才技之士，岁十人，杂于使行稗译之中，以一人领之，如古质正官之例，以入于中国，往学其法，或买其器，或传其艺，使颁其法于国中，设局以教之，出力试之。视其法之大小与功之虚实以为赏罚。凡一入三入，三入而无效者，黜之而改选。如此则十年之内，中国之技，可以尽得。向之方千里者，始可以方万里；向之三四年之谷，始可以一年而得之矣。若是而财赋不足，国用不裕者，未之有也。夫然后，虽人服锦绣，户设金碧，将与众乐之而不暇，亦何患乎民之奢侈也。"㉔从文中不难看出，朴齐家认为政府应该重视的不是节俭而应该是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老百姓富裕了，国家就会强盛，那庶民百姓奢侈一点又有什么呢？

朴齐家也和其他北学派一样，认为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改进技术就必须向中国学习。他在《北学议》的"财赋论"中写道："善理财者，上不失天，下不失地，中不失人。器用之不利，人可以一日，而我或至于一月二月，是失天也；耕种之无法，费多而收少，是失地也；商贾不通，游食日众，是失人也。三者俱失，不学中国之过也。"㉕

北学派们认为，清人虽属夷狄，他们进入中原已经百余年，而且国泰民安，这应该是上天的又一安排。清人继承和接受了中华法度，并加以传播和推广。事实上，清朝确比朝鲜先进得多。因此，朝鲜应该向清学习。他们强调，要派人到中国去学习制造砖瓦、车船及其他技术，并把它用来发展朝鲜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在此基础上朝鲜才谈得上北伐。

朴齐家在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鲜不发达的症结所在，他说："岭南（庆尚道）的孩子不知道虾酱是什么味道，关东（江原道）的居民只会用木瓜做酱油，西北（平安道）的人不辨柑与桔，沿海的人用沙丁鱼做肥料。孰不知这些沙丁鱼拿到汉城去一条就可以卖一文钱，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收入啊。现在的六镇（咸镜北道的庆原、庆兴、富宁、稳城、镜城、会宁）的麻布，关西（平安道）的绢布，西南（庆尚道、全罗道）的楮纸，海西（黄海道）的棉和铁，内浦（忠清道和西海岸一带）的鱼盐等都是民生日用不可缺少的东西。青山、报恩地方的大枣，黄川、凤山地方的梨，兴阳、南海地方的柑桔，林川、韩山地方的丝麻，关东地方的蜂蜜也是民生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地方很容易弄到，但在别的地方又很难得到，因而十分贵重。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交通不便很难运输造成的。其责任全在士大夫，他们虽然在读《周礼》时大谈输人、舆人、车人、周人之类的言词，但却对其运作不进行研究。"㉖接着，朴齐家又指出，促进地方物产在全国流通，对平衡物价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朝鲜东西有一千余里，而南北几乎又是东西宽度的三倍，汉城位于半岛的中间，是全国的物资集散地。""朝鲜三面临海，若用舟船在沿海航行，通商的人即使再远，五、六天的时间也能到达汉城，近处的商贾只要两三天就可以了。就是从半岛的这头走到那头，也不过再加一倍的时间就够。如果像唐朝一样能疏通漕运，平衡物价，再加上要把像刘晏这样的能人分派到各地进行监督的话，物价的贵贱几日内便可平复。"㉗

此外，北学派们还指出，全国物价没有得到平衡的原因，是因为全国还没有使用畜力车的缘故。为了说明各种车的巨大作用，他们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灌溉和灭火用的龙尾车，打仗用的战车，抽绢丝用的缫车等都作了详尽介绍，就连它的操作方法都做了详细说明。

根据自己学得的中国的经验和朝鲜的实际情况，朴齐家指出，一辆畜力车所装的货物总不

如一条船装得多，陆路行千里还不如水路行万里便利。因此，他主张学习中国制造舟船的经验，发挥朝鲜三面环海的优势，把航运搞起来。他还特别介绍说，中国造的船船内干净，又非常干燥，一滴水也看不到，而朝鲜造的船木板雕刻很不精细，板缝中经常渗水，很容易使装载的货物发霉变质；中国的船舶有甲板，人可以上楼下舱，人在甲板上可以过得比较舒畅，船舱还可以装载很多货物，而朝鲜的船员、货物、器物均在一处，不仅装载量少，而且很不方便；中国的船坞都搭有栈桥，人可以自由上下，而朝鲜的船坞没有栈桥，都靠人背马驮上下船，很不方便。㉘

不仅如此，北学派们还从中国学了不少建筑方法和建筑技术，尤其对中国使用粘土烧砖的技术很感兴趣。朴趾源和朴齐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中国建造房屋都要入地五、六丈，出地五、六丈用砖砌，楼台、城郭、墙垣、桥梁、坟墓、沟渠、堤坝等都用砖砌。因此，老百姓不必担心水火或者湿朽及建筑物的倾圮。与此同时，他们又指出，墙砖比石材更加优越，墙砖好粘合而石材则很难。墙砖在一定的规格下可以大量生产，而石料加工却要耗费不少的人力和财力。㉙此外，墙砖还可以用来构筑城郭、城楼与瞭望台，车辆在战时还可以变为军用装载辎重，一技多用，应该模仿。

朴齐家还就打埂、施肥、种稻、水利、种薯等一系列务农方法同中国作了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针对朝鲜落后的农业技术，朴齐家指出，中国谷物已经变成了粮食，而我们的稻子还没有收割；中国已经用丝造出绸来，而我们却连丝都没有；中国已经弹好棉花，而我们却还没有摘棉花；中国人已经会用鹰鹞来打猎，而我们却连用马打猎都不熟练。在朝鲜，两人只能弹四斤棉花，而在中国的弹花坊，一个人一天却能弹八十斤，如此等等。接着，他又指出了改良农具的重要性，并对中国的锄头、石杵、碌碡、弹花弓、绞车、缫车等表现了极大的兴趣。㉚

北学派为了使朝鲜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他们都很强调同国外进行通商。

朝鲜西海同中国的山东半岛相距不远，可以利用海上交通同中国进行贸易。此外，日本、琉球、安南、西洋诸国也同中国进行贸易，朝鲜还可以利用同中国做生意的机会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以“使国人广耳目，知天下之为大。”㉛

北学派主张向中国学习，同中国进行通商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要让朝鲜走向世界。为了走向世界，他们提倡国家应当选拔人才学习汉语、西洋语、满语、日语和蒙古语。㉜

此外，朴趾源还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了扩大海外贸易对清除朝鲜积弊的重要作用，他说，“夫游食者国之大蠹也，游食之日滋，士族之日繁也，此其为徒，殆遍国中，非一条科宦所尽羁縻也，必有所以处之之术然后浮言不作，国法可行。臣请凡水陆交通贩贸之事，悉许士族入籍，或资装以假之，设廛以居之，显擢以劝之，使之日趋于利，以渐杀其游食之士，开其乐业之心，而消其豪强之权，此又转移之一助也。”㉝

北学派们主张，只有同中国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才是朝鲜救贫富国的唯一出路。这一理论，当时在朝鲜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推动朝鲜的进步与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结　论

十八世纪中叶，仕宦出身的年轻人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随使团去燕京，亲眼目睹了清朝的乾隆文化，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了现在的清人不同于过去的夷狄族。在思想上，他们依据“人、物同性论”的观点，一扫旧华夷论的陈腐观念，使国人大开了眼界。

洪大容提出了我们认为中国是正界，西洋为倒界，而在西洋人看来，自己是正界，而中国却

也是倒界的辩证观点。这一华与夷为一的"新华夷论"告诉人们，华与夷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使他是夷狄，如果比朝鲜先进，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而朴趾源则不然，他在不抛弃旧华夷论的前提下主张朝鲜人要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因为他认为清朝文化实质上是汉人文化，不是夷狄文化。㉞

北学派们为了富国强兵提出了革新技术和发展工商业的主张，甚至还提出应当邀请在华西洋人来朝鲜制造机器，选派士大夫子弟去华留学。

以上这些主张都是进步的，如果朝廷能够一贯重视这一理论，无疑是会促进朝鲜发展的。但是，1800 年正祖驾崩后，朝廷便把北学派斥为西学邪教而加以迫害。从此，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朴趾源便被迫过起了隐居生活，朴齐家被流放到了偏远地区。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北学派才在实学派的支持下得以复苏，他们开始接纳中国的实证学，但是，他们的进步思想也被"卫正斥邪"的保守势力所抹杀，从而使朝鲜的闭关锁国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使朝鲜失去了进入近代化的机会，致使后来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并吞，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使日本侵略者侵占朝鲜达三十六年之久。

自古以来，不管是哪个国家，封闭都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不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信息来源就会被切断，自然就要落后于别的国家。弄不好还会被动挨打。未来的世界，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果没有国与国之间的频繁交流，就无法使本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因此，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为了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就要坚持做好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工作，以促进国家的不断进步与繁荣发展。

---

①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70,30 页)

②参看《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九和《通文馆志》卷三。

③李元淳:《赴燕使行的经济小考——以非官方贸易活动为中心》(《历史教育》第七辑,1963 年 6 月,107—108 页)

金圣七:《燕行小考——朝中交涉史一瞥》(《历史学报》第十二辑,1960 年 5 月,48—59 页)

④洪大容:《湛轩书》(千宽宇、柳承宙译。汉城,大洋书籍出版,1982 年,参见"千宽宇解说"11—19 页)

⑤朴趾源:《热河日记》(李家源译。汉城,大洋书籍出版,1982 年,参见"李家源解说"21—26 页)

金龙德:《朴齐家的经济思想——奇迹般的先觉者》(《震檀学会》第五十二辑,1981 年,156 页)

⑥朴齐家:《北学议》(李锡浩译。汉城,大洋书籍出版,1982 年,参见"李锡浩解说"19—25 页)

⑦姜在彦:《韩国的开化思想》(郑昌烈译。汉城,比峰出版社,1989 年,11 页)

⑧姜在彦:同上书,11—13 页。

⑨洪大容:《湛轩书》的《毉山问答》

⑩洪大容:《湛轩书》的《又答直齐书》

⑪洪大容:《湛轩书》的《心性问》

⑫洪大容:《湛轩书》的《毉山问答》

⑬朴趾源:《热河日记》的《駬汛随笔》

⑭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玉匣夜话》

⑮朴齐家:《北学议》的"北学议序"

⑯朴趾源:《热河日记》的"行在杂录序"

⑰朴齐家:《北学议》的《农蚕总论》及《尊周论》

⑱金龙德:《朝鲜后期思想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史,1977 年,561 页)

⑲朴趾源:《热河日记》的《渡江录·六月二十七日》
⑳朴齐家:《北学议》的《农蚕总论》
㉑朴齐家:《北学议》的《甓》
㉒朴齐家:《北学议》"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朝参时,典设署别提朴齐家所怀"
㉓朴齐家:《北学议》的《市井》
㉔朴齐家:《北学议》的《财赋论》
㉕朴齐家:《北学议》的《财赋论》
㉖朴趾源:《热河日记》的《车制》
㉗朴齐家:《北学议》的《车》
㉘朴齐家:《北学议》的《船》和《通江南、浙江商舶议》
㉙朴齐家:《北学议》的《甓》
㉚朴齐家:《北学议》的《牛》、《农蚕总论》及《农器》
㉛朴齐家:《北学议》的《通江南、浙江商舶议》
㉜朴齐家:《北学议》的《译》
㉝朴齐家:《北学议》的"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朝参时,典设署别提朴齐家所怀"
㉞闵斗基:《<热河日记>初探》(《历史学报》第二十辑,1963年,114页)

(上接第115页)
为业,除《旧档》多有记载外,还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一书中多有记载。我认为,作者这一看法,是迄今论述较完备者,有新见解,将清建号前的国号问题的研究又推进一步。

三、关于"诸申"一词的语义

满语 jušen,即汉语"女真"二字的对音。历史典籍记载的女真、虑真、朱先、珠尔真、朱理真、诸申、珠申、朱里扯特、主儿扯惕、拙儿察歹等,是同音异写。作者认为,满语 jušen 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多义词。其原始意义应是女真族称,后为女真人的泛称。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颁布改族称的诏令后,才确定为专称,即八旗牛录统辖下的"属民"。作者列举了《旧档》的大量记录,阐明了 jušen 一词的这种历史嬗变。作者进一步指出,"属民"的成份很复杂,有从耕的农民,有服役的士兵,还有经商的业主和工匠,甚至一般的八旗官吏。它不是满洲社会中一个阶级或固定不变的特定阶层意义上的专称。确切地讲,应是后金奴隶占有制国家平民的通称。那种仅依据清代辞书中对 jušen 一词的汉文释义或以汉文文献时常出现的"满洲奴仆"字样,便认定其为奴隶的观点,是不妥的。作者对 jušen 一词的新解释,比以往各种解释,更加完善和全面。